

# 2008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荣维木 高士华

##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 (一)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一般是以内阁、政府、军部为研究视角,而以下两篇文章则从另外的视角考察了这个问题。一是戚其章的《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以往有人认为:关于日本早期有兴亚主义,应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而其中“中日提携”论出于兴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潮史是占有适当地位。针对这一观点,作者具体地分析了兴亚主义思潮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作者认为,兴亚主义思潮流派比较广泛,其中包括宗教启蒙派、文化复兴派、自主联盟派、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等等。虽然其中不乏倾向革命的派别人物如宫崎滔天等,但他们并非主流。在兴亚主义思潮中起主导作用并对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则是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他们的观点并非要建立亚洲各国的互惠互利,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作者还分析了大力推动兴亚主义的兴亚会,认为它并非如一些人所言是“民间组织”或者“民间对华友好组织”,而是日本外务省直接掌控和主导,并有军方参与运作的一个情报机关。该研究的价值在于,澄清了史实,启发人们走出了一个误区。二是史桂芳、王柯的《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该研究主旨是分析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及其与日本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文章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十分关注国内外形势,主动研讨国家对策,为政府充当参谋。昭和研究会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它组织各种专门的研讨会,讨论日本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題,力图对日本政府施影响。昭和研究会近卫组阁、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实行国内新体制等方面发挥了管理权限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知识分子及其团体对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另外,作者也注意到确有左翼人士参加了昭和研究会,并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提出过批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深刻。他们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比较复杂,厘清史实和辨别是非,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战争状态下日本国民的思想状况。

关于日本的具体侵略扩张政策,还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鹿锡俊的《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以往,人们研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多以日美双方的直接矛盾以及日本早已制定的北进、南进政策为视角,而该文则以大量的日本原始档案,验证了中国问题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在联系。作者提出:“中国的对日战争既是对日本死守既有侵略果实之企图的重大障碍,又是对日本力图进一步实现北进、南进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扩张野心的最大牵制,从而也是对美英等国的全球性利益

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日本当年在中国问题上沉迷不醒,其症结就在这里;美国最终拒绝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其关键亦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他的观点并非原创,但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决定作用,并且运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进行验证,仍可使读者受到新的启发。二是臧运祜的《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以往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多以事变对中国政局的改变为视角,而对于日本对事变的反映较少涉及。该文则完全以事变对日本决策的影响为研究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史实辨证与分析。作者认为: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却打乱了日本的侵华步骤。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延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事变情况后,日本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尤其是中国统一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大动荡。林铣内阁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方针。“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回归于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上了全面侵华道路。该文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短短半年间日本侵华政策变化的复杂过程。

## (二)中国抗战研究

### 1. 在军事政治方面,如下研究值得注意。

关于国共合作与纷争,邓野的《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较具新意。该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对事变政治了结的全过程。作者提出:“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士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和缓。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该文的价值在于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结论颇具新意。

关于战时人力动员、兵役制度以及军人优抚研究,有如下研究引人注目。一是江红英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该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对于全国人力资源的管制和利用。文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战时国民政府在制定实施兵役政策、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的过程中,是如何平衡全国人力资源的。作者归纳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是: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等项。作者对于国民政府人力管制的评价是:“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相去甚远。”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与以往研究不同,作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国民政府的战时人力动员政策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二是张燕平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该文详实地考证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政策的制定实施情况。作者认为,战时国民政府的兵役政策中虽然也有招募志愿兵的内容,但实际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尤其抗战中后期,兵源主要取之于义务兵役制的实施,以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取得了成效,但也出现了诸多严重弊端。该研究的价值在于,比以往更详实、系统地叙述了战时兵源问题。三是莫子刚的《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载《抗日战争研

究》2008年第4期)。该文章属地域性研究,主题是贵州兵役制度的实施。与上述张燕平文章相对应,该文的价值在于,以比较具体的个案事例,诠释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实施的利弊。四是李翔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该研究以战时国民政府陆军抚恤为对象,具体地考证了国民政府战时抚恤机构成立与运行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战时抚恤机构分为中央、军队和地方三个层面,而对这三个层面分别考察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伴随着机构的逐步健全,抚恤比例明显上升,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抚恤观念相应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不过……至抗战后期,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开始显现,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五是沈阳的《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优抚评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该文章亦属地域性研究,与上述李翔的研究相映,该研究是以地方的具体案例,佐证战时国民政府优抚工作的得失。六是宿志刚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与上述李翔、沈阳的研究相映,该研究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象,具体地考证了陕甘宁边区对军人的优抚工作,内容涉及边区政府抗日军人安置政策的制定及其演变,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作者结论认为:“边区退伍军人的安置,对边区的社会稳定,激励士气,推动扩军、归队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在战时外交与国际关系方面,如下研究值得注意。

关于战时中美关系研究,赵入坤的《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再探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引人注目。文章点评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新政策的特征为“促进苏蒋接近和中国国共两党接近”;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由扶蒋容共到扶蒋反共政策的转变,是在1945年4月发生的。作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是主流的观点,并对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因素是美国的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分析这些因素后他结论认为:“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该研究对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中英关系研究,丁兆东的《中国访英团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探讨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该文叙述了1943年底国民政府派遣中国访英团(又称报聘团)访英的曲折过程。作者利用了大量中英文资料,对访英团出访前后中英关系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对国民政府访英计划的分析,显示出战时中英关系的复杂性。该计划内容涉及香港问题、九龙问题、西藏问题和印度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英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从访英结果来看,双方均避免讨论这些有分歧的问题,而强调共同利益,使中英关系得到了加强。1944年中英签订5000万英镑贷款协议,与此不无关系。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以访英团的活动为主线,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战时中英关系的具体状况。

同样涉及战时中英关系的研究,还有蒋耘的《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载《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作者利用了大量档案史料,叙述和分析了1943年中英间关于西藏危机交涉的过程。文章认为,“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康印公路交涉中,为保障中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以高超的外交才智,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对战时中英关系研究有启发,对现实西藏问题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

关于战时中法关系研究,黄庆华的《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载《抗日战争研

究》2008年第3期),应该引起注意。文章是通过对战时中法关系中的几个重要事件来考察两国关系的演变。由于战时中法两国不仅同是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并且战时两国都曾出现了与日本合作的伪政权,因此两国间呈现了比较复杂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蒋介石与戴高乐及其法国临时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收容法国在越南的败军、法国交还广州湾租借地、宋子文拜访戴高乐、国民党越北交防并撤军等事件的考察,详实地叙述了战时中法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总结认为,战时任何一个阶段的中法关系,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该研究给人的启示也恰如作者所言:历史证明,任何以互相利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非常脆弱和难以长久维持的。

在战时国际关系研究中,还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胡越英的《二战后期美国马特洪恩计划与核战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该文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即美国“马特洪恩计划”与核战略之间的关系。“马特洪恩计划”是指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美国空军从中国和印度出发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的计划。关于该计划,在美国已有比较多的研究,但作者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即该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者利用史料分析认为,“马特洪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处于最优先的地位,正是美国核战略优先的体现。而根据原子弹计划解密后当事人的回忆,“马特洪恩计划”至少是“曼哈顿计划”的外围部分,即为原子弹的最后投放做各种充分准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最后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部队正是执行“马特洪恩计划”的航空部队。这虽然是一家之言,却为人们研究美国的在二战后期的核战略提供了一个参考。二是郑会欣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待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载《社会科学(沪)》2008年第7期)。该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对于雅尔塔会议本身的分析,而在于作者首次把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运用到这一研究中,从而印证了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严重伤害与国民政府“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无奈境地。

### 3 在战时社会研究方面,如下研究值得注意。

关于战时天灾问题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是张同乐的《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该文以1940年华北蝗灾为背景,叙述和对比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对应蝗灾的情况,结论认为:“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的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该文的价值在于从一个方面表述了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二是胡惠芳的《抗日战争时期苏皖边区的救灾渡荒工作》(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该文同样是叙述抗日根据地的救灾活动,而与上文不同的是,作者不仅考察了救灾的应急措施,还考察了诸如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长远的救灾方式。该研究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认真总结其救灾的经验教训,为今天淮河流域的治理提供借鉴不无补益。”

李在全、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该文考察了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并审视了这些活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另外还探讨了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挑战了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传统观点,这正如作者总结所说:“如果摆脱‘革命’与‘改良’这样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大方向和实践内容是符合农村现代化规律和历史潮流的。”

### (三)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关于战争财产损失研究,袁成毅的《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抗日战争

研究》2008年第2期)较具新意。作者认为:“中国抗战损失是一个涉及范围广、调查与统计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极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因为不同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都会产生较为悬殊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战后60多年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总数出现了多种说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首先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列举了在不同时期关于战争损失的不同统计结果。之后,作者具体地分析了关于战争损失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和损失价值计算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个人见解,认为应进一步挖掘史料,第一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有关战争损失的调研材料。第二是战争期间有关机构所做的调研。第三是整合大陆与台湾相关档案。第四是地方史志部门所藏史料。另外,作者还提出应该注意调查与统计的历史延续性。最后,作者强调研究工作中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尽管作者并没有提出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确切数字,但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能给研究者很多启示。

关于战争赔偿研究,高凡夫的《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引人关注。作者提出,“区别论”(即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和“人民外交路线”是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对于基于友好因素放弃赔偿要求做法所造成的结果,作者进行了分析:首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友好,使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次,“‘区别论’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和片面化,不利于日本民众认清自己应负的战争责任、反省战争罪责”;再次,“给当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带来一定困难,但不具有必然联系”。显然,该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现实意义。

关于战后审判,张生、翟意安的《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值得注意。作者利用了最新收集的史料,对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质证做了比较详细地叙述和分析,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松井石根的证词和质证。通过对证词和质证的分析,作者指出:“早在东京审判之时,松井等被告和很多日籍证人已经就南京大屠杀做了伪证。但通过质证,证实松井与南京大屠杀关系十分明确。”“从法庭的判决可以看出,辩护方和起诉方的相互质证,结果形成了重要影响。”而法庭对于起诉方对松井石根多项指控的否决,以及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被判无罪,说明法庭充分吸取了辩护方的意见。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当年即已存在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伪证,也在于对东京审判的公证性予以了有力的证明。

## 二 日本方面的研究

2008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比较集中,这主要是因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集中出版,而一些热门研究领域,如台湾殖民地研究、“满洲国”研究、中日战争研究、留学生研究,依然有比较突出的成果出现。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近年来从东亚整体来研究中日关系的成果增加了。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历史研究也增加了对整体研究的关注,对东亚以及对日本帝国时期的研究成了热门领域。

並木赖寿的《日本人的亚洲认识》(日本人のアジア認識),由山川出版社出版,该书讨论了日本的文明开化和对中国认识的变迁。冈本隆司的《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由讲谈社出版,该书从世界史的角度,讨论近代中日韩关系的演变,饶有新意。

《日俄战争与东亚世界》(日露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由人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日俄战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不但讨论日俄战争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也关注那场战争对整个东亚的影响。其中,吉泽诚一郎的《日俄战争和中国》(日露戦争と中国)指出,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中

立的立场,但留日学生受到日本报道的影响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通过这场战争,日本的国民意识也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川岛真的《日俄战争与中国外交》(日露戦争における中国外交),分析了清政府采取中立立场过程中所发生的混乱情况,并指出这种混乱事实上形成了对日本有利的局面。

另外,有两本著作很值得关注,兰信三主编的《日本帝国人口移动的国际社会学》(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由不二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朝鲜、满洲、桦太(即库页岛)、台湾、南洋五个部分,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对所谓的日本“帝国”内部的人口移动,做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其中,不仅台湾和“满洲”部分值得参考,由于当时日本政策的关联性,其他区域也值得参考比较。该书由20多名作者合作完成,有852页,可谓洋洋大观,值得一读。

冈本真希子的《殖民地官僚的政治史——朝鲜、台湾总督府和帝国日本》(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由三元社出版。该书965页,由作者一人独立完成,从两个总督府的内部体制到官员制服,都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对于台湾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春山明哲主编的《近代日本和台湾》(近代日本と台湾),由藤原书店出版,该书从雾社事件和日本的台湾殖民统治政策两个角度,对日本的台湾殖民历史进行了解剖,其中特别分析和台湾有关系的三个人物,原敬、后藤新平和冈松参太郎,对他们的殖民政策及其作用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

对“满洲国”和东北的研究中,桂川光正的《关东州鸦片制度的制定和中国商人》(関東州阿片制度の制定と中国商人)刊登于《史林》第91卷第2期,分析了关东州的鸦片贩卖制度和中国商人的关系。

前川惠司的《归乡》由三一书房出版,该书介绍了满洲建国大学朝鲜学生吴昌禄的一生,战争结束时他被抛弃在了库页岛,作为一个前日本帝国的臣民,他不能和日本人一起前往日本,在半个世纪的漂泊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韩国,该书通过吴昌禄的曲折经历,分析了建国大学的所谓民族协和的真相,以及殖民地历史中过去和现在的复杂关系。

对于中日战争的研究,比较广泛,基于前因后果的关系,其分析也往往超出这段历史,进行全近现代的整体分析,但重心基本不会改变。

仓桥正直的《鸦片帝国日本》(阿片帝国日本),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由共荣书房出版,其作者对日本的鸦片等毒品问题有精深的研究,曾出版过《日本的鸦片战略》《日本的鸦片王》,也编辑过有关鸦片问题的历史资料。他指出,出于侵略的需要,日本政府把不吸食鸦片的日本和朝鲜变成了鸦片原料的供应地,在日本的和歌山县和大阪府都有种植,在中国的关东州和后来的“满洲国”、台湾都实行鸦片专卖,原料都是从外国输入,或者只允许在指定的地区种植,以获取暴利。在中国政府的控制区域,日本利用领事裁判权,大肆贩卖吗啡。到1935年,日本的吗啡生产量已经居世界第四位,海洛因居世界第一位,占全世界生产量的40%,可卡因也是世界第一。日本大肆生产毒品的目的就是向中国出口。但是,禁止毒品的国际条约日本都参加了,所以日本政府要极力隐瞒事实。在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更是大规模地扩大生产,其目的就是支撑越来越紧张的战争财政需要。

坂本勉主编的《日中战争和伊斯兰教》(日中戦争とイスラーム),由庆应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讨论了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展开,日本政府认为,对于伊斯兰教的调查、研究都变得越来越必要,于是开始投入人力物力。该书涉及中国的部分,主要是对所谓蒙疆政权中的回民问题,以及所谓的对西北的回民工作,进行了介绍分析。该书还介绍了满铁的谍报网对有关伊斯兰教地区的情报搜集情况。

米滨泰英的《“山西残留”日军》是原日军少尉山下正男的口述史,由口述史企划出版。山西抗战结束时,2600名日军留下来参加了中国内战,其中550人战死,700人成了俘虏,山下正男就是俘虏之一。他被俘后在监狱里关了5年,于1954年回到日本。该书通过他的经历,反映了当时日军和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村成雄和田中仁主编的《中华民国的制度演变和东亚地域秩序》(《中華民國の制度変容と東アジア地域秩序》),由汲古书院出版,该书是2007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述范围比较广泛,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战前后的论述相对多一些。

留学生的研究,周一川发表了《中国女留学生的素养》(《中国人女子留学生のリテラシー》),刊登在《历史评论》第696期,该文指出,近代的女留学生对于女性解放和近代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杉本史子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汤国梨和务本女学》(《辛亥革命期の湯国梨と務本女塾》),刊登于《立命馆文学》第608期,该文强调指出,女学在革命运动和女权运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菊池一隆《在日中国和“满洲国”留学生的对日抵抗》(《日本国内における在日中国・「満洲国」留学生の対日抵抗について》),介绍了抗战期间在日留学生的抗日活动,该文刊载于《人间文化》第13期。

除以上的论著以外,小川正树的《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北海道华侨社会的形成》(《明治・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北海道華僑社会の形成》)刊载于《史册》第41期,对北海道华侨社会形成的研究,视角独特。新地比吕志的《九一八事变期间汪精卫的对日外交政策》(《満洲事变期における汪兆銘の対日外交政策》),刊登于《东洋史访》第14期,对于汪精卫的对日政策有新的探讨。孙江的《连续和断绝——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二十世紀初期中国の歴史教科書における黄帝叙述》),刊登于《中国研究月报》第728期,对于黄帝形象的变迁做了详细的分析。

冯青的《清末海军视察和日本的对应》(《清末の海軍視察と日本の対応》),刊登于《现代中国》第80期,《1910—1920年代中国海军的困难和日美》(《1910~1920年代中国海軍の困難と日米》),刊登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第23期,两篇文章都是讨论中国海军问题的,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海军问题有细致的分析。甲午战争之后的海军研究,以往不太受重视,因此这两篇文章都很值得参考。

(作者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高士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